

西北联大：矗国之偏隅 立世之英才

■姚远

在西北大学老校区的大礼堂左侧，有一块不大的石碑。黑色的碑体上，镌刻着由东北大学老校长张学良题写的几行大字——沈阳设校，经始为艰；至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勤尔多士，复我河山。

这座石碑矗立的地方，最早为晚清时期西北大学陕源农科前身所在地。1937年9月至1938年3月，这里又成为了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第二院的校址所在。在它背后的大礼堂中，曾有水利大师李仪祉、地质学家张伯声、我国科学史学科的开拓者李俨（李乐知）慷慨演讲，也有丁玲、田汉、贺绿汀等大家学者与西安临大学生在此校园交流。1938年至1946年，此地为胡宗南“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驻地，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曾在大礼堂训示，另相继有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于右任、顾维钧、程天放、胡适等历史名人在此讲话。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也在此任教官。

这座礼堂是战时我国第一所流亡大学——东北大学与战时规模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之一——西安临大一西北联大的办学地，是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代的我国高等教育风云际会之地。它见证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局部抗战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全面抗战期间，中国高等教育的两次重大变迁，也目睹了几代中国高教人在国难期间不畏艰险，与西部大漠播撒中国高教火种的感人故事。

于西部大地开枝散叶

让我们将时间回放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国难岁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后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我国最根本的文脉所系——高等教育也面临国破校亡、根基沦丧的空前灾难，尤其是大学数量接近全国半数，在校大学生占全国2/3以上的东北与平、津、沪三地，面临的危险最为严峻。在此期间，先有东北大学自东北向北平、向西安的颠沛流离，再有平、津高校的空前浩劫。

基于此种时局，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9月复并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这两所“临时大学”也成为了日后彪炳中国教育史册的西南联大以及西北联大的前身。

当时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校有1472名学生，分为6个学院24个系，又分为三大院，分置于西安市内三处：校本部、第一院的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在西安城隍庙后街；第二院的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体育学系，以及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共处一院；第三院的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在北大街通济坊。

1938年春，日寇窜抵西安以东130公里的风陵渡，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被迫南迁到了陕南的汉中地区办学。当年4月，在同一条命令下，位于昆明的大理临时大学被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陕南的西安临时大学则被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院系依旧，分布在陕南三县六地。

虽然“起点”相同，但两所大学此后的命运却是迥异的——在此后的十年间，西南联大坚守于祖国的大西南，躬身存身。而西北联大却在短暂的合并后，开始了一场在西北广袤土地上开枝散叶的艰辛历程，书写了一曲中国西北高等教育的壮阔篇章。

西北联大刚刚在陕南站稳脚跟后的1938年7月27日，教育部先后指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含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和国立北洋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即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至1939年8月8日，再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史称“国立西北五校”。

时至1944年底，五校之中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往甘肃兰州办学。1946年抗战胜利后，曾组成西北联大的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国立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东北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分别在北平、天津、沈阳、洛阳等地复校，而国立西北医学院并入国立西北大学回迁西安，国立西北工学院则回迁咸阳和西安。

如此一来，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格局中，便形成了与西北联大直接相关的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东北大学（国立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农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工程大学、陕西理工大学、西昌学院等30余所与之血脉相连的高校。

这一高教格局的形成，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近现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向来以“点”“线”的形式分布于沿江、沿海或铁路沿线，而西北联大及其后院校，却在祖国的西北“面”上进行了展布，从而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点线布局到面上布局的历史性转折，也初步打破了高等教育在平、津、沪等城市“重床叠屋”式的畸形分布。

西北联大作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母机”，共哺育了30余所高校，开创了我国西北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也催生了我国西北的现代学制，彻底结束了封建教育的历史。

西北联大在承载中华民族文脉薪火相传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了一个完整高教体系在祖国大西北展布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

编者按

提到20世纪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历程，有一些名字是足够闪耀的，比如民国教育之父蔡元培，比如培养出刘振宁、李政道、赵九章等一大批学术巨擘的西南联大……然而，有些名字却并不如前者这样令人瞩目，但却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书写着同样足以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这其中的代表，便是与西南联大同时建立的西北联合大学。

自1938年建校，至1939年改组为“国立西北五校”，西北联大在中国高教史中存续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正是这段不长的岁月，连同其前后的发展演变，却对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乃至于当代我国整体高等教育格局的形成，产生了足够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份历史意义，只有当我们回溯它的历史时，才能得到最真切感受。

今天，就让我们在这份对历史的追忆中，重新认识或许我们此前并不熟悉的西北联大。

把论文写在千里大漠——西北联大教授故事三则

■姚远

故事一
茫茫沙海中的殷祖英和沙玉清

西北大漠漫黄沙，结伴沙公走荒遐。沙风沙雨同拌沐，沙枣沙葱共噬噉。

弱水三千沙门子，沙漠道里夜停车。玉关西出沙州路，敦煌郊外听鸣沙。

沙漠道上秋萧瑟，白龙沙堆映晚霞。闻道沙雅多古迹，莎车百里富桑麻。

茫茫瀚海同沙漠，愧我无缘涉流沙。引矣沙公多颈捷，担当篝火话南沙。

这是1943年10月28日，国父实业计划考察团赴新疆考察时，西北自然资源研究专家、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殷祖英教授赠给我国农田水利和泥沙研究专家、国立西北农学院水利系主任沙玉清教授的一首诗，题为《赠别沙公》。诗中每句均有一“沙”字，不仅生动描绘了沙玉清与沙有关的职业，也生动记载了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等西北联大后继高校学者在黄沙弥漫下，参与民国时期西北科学考察的艰苦情景。

殷祖英曾任西安临大地理系教授、西北联大地质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国立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42年春，他在国立西北大学期间，曾奉命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深入甘、宁、青、新实地考察，同年冬返校并数度举行学术讲演，详细介绍动植物、民族特性、油矿资源等，并测绘出有关地图。

沙玉清1937年毕业于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同年回国，他先后担任了国立西北农学院水利系教授兼系主任，并主持建成了“仅社水土经济试验室”（即中央水工试验所与西北农学院合设了武功的水工试验室）。后来，该室扩建为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他所著的《农田水利学》也成为了我国首部农田水利著作，标志着我国农田水利学科的创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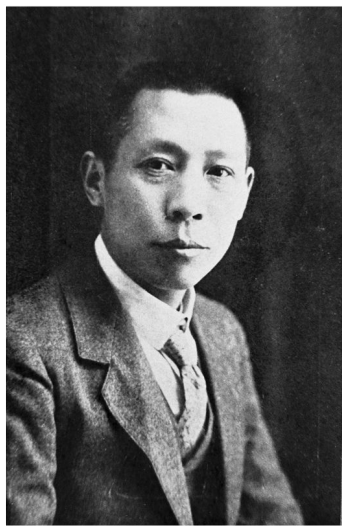
殷祖英要长沙玉清12岁，一个专长于资源地理，一个专长于泥沙治理，学科背景上有很多互补之处，故在献身西北的工作中结下深厚友谊。沙殷二教授虽不同年生，但碰巧的是，二人均在1966年去世。沙公的祭日在10月30日，殷公的祭日在9月7日。沙玉清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病，晚年又患肝硬化病，常常彻夜难眠。他的《泥沙运动学引论》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的，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才得以出版。他为农业水利教育事业、为泥沙研究奉献了整整37年，不到60岁，便含着对未竟事业的无限眷恋，撒手人寰。

故事二
驼背上的黄文弼

1943年6月的一天深夜，爱国西北大学委托参加国父实业计划新疆考察团的黄文弼教授，刚刚拉着路驼回到驻地的帐篷，便不顾身患痼疾，又开始秉烛写考察记录。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即便回到城固，他也常常秉烛至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城固考院校本部影壁



徐诵明

凌晨二三点，一生笔耕不辍，达数百万字，真可谓行万里路，写万卷书。

黄文弼虽籍贯江南，但其韧性却像是十足朴实的西北汉子，甚至由于常年在大漠中考察，以至于回到城固而难以适应定居生活，衣着也很简陋。据他的历史系学生向玉梅回忆：“黄文弼教授一身中山装，不知穿了多少年，两袖发亮，肘下裂缝，我们望着他的衣服，常常联想到博物馆的陈列品。黄教授教的是边疆史，我们这些缺德鬼，常说教授的衣服没有边缝。”

1937年10月至1947年9月，黄文弼先后担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教授兼主任、边政学系教授兼主任，加上1935年至1937年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驻西安碑林的工作，他前后在陕历时12年，占其40年学术生涯的1/3。这也是他1927年开始西北科学考古以来，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也使其在抗战后方有了一段较为集中和充裕的时间，能够对1927年首次考察和1933年的第二次考察所得进行整理和出版。他一生曾四次深入亚洲腹地新疆进行科学考察，并在民国期间出版50篇《论》著，其中的24篇《本》便是在这个时期完成并出版的。

在第一次新疆科考中，黄文弼成为首位穿越塔克拉玛干千里无人区的中国学者。该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是我国第一大沙漠，这里因为条件极其严酷，被人们描写为“生命禁区”。但黄文弼不仅成功穿越，还发现了沙漠腹地的古代城镇、寺庙、沟渠、烽火遗迹和屯戍遗迹，获得大量文物。这些遗址和文物对该地古国兴衰和丝路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第一次科考和第二次科考中，黄文弼还两次进入罗布泊，成为第一个到达死亡之海罗布泊北部的中国学者。

在黄文弼首次踏上西北科考之路时，有外国人预言：他们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走出包头不远，就会全体折返。然而，黄文弼这一走就走了38000公里，前后历时近六年，并且成为了当时进行新疆专门从事考古的唯一中国学者。在考察中，他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既有对“纸上材料”和“地下之材料”的相互印证和“异族之故事与吾国旧籍”的相互印证，又有外国学者与吾国学者研究成果的相互印证和室内研究工作与野外实地考察工作的相互印证。

此外，黄文弼还出版了多本考古专著，其中《罗布淖尔考古记》是我国第一部符合现代考古学体例的考古报告，实现了晚清民初以来，中国学术传统向现代学术形制的转变。黄文弼本人也被誉为我国西北考古第一人、我国科学考古第一人、我国国际合作科学考察第一人。

故事三
敦煌沙窝里的王子云

1941年，正值战火纷飞之际，一群学者

却在后方以所学报国，以不同的形式坚持抗战。当时，从兰州去往敦煌的路上，就出现了11位钟情于艺术文物的艺术家们的身影。

他们从兰州到敦煌，坐汽车的行程要走1100公里，但汽车只能坐到酒泉，所以他们只能从酒泉再坐骡车走三天三夜约280公里到安西，再换乘木轮牛车到达敦煌。他们坐在盖有毡席的骡车里，但根本不能阻挡住骡车外夹杂着飞沙走石的风鸣声，因为走的是沙窝路，软沙没胫，骡车难以通过，又因无路骆驼可雇，只好改坐农家的木轮牛车。

这就是当时以王子云为团长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考察途中的一个场景。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王子云率团历时五年，行程十万余里，足迹遍及川、陕、豫、甘、青五省。他们运用摄影、临摹、模铸、拓印、测绘、记录等方法，发现与保护了大量文物艺术珍品，并就中国专家在国家层面首次对西北文物所进行的科学、系统考察。

王子云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和艺术考古学派的先驱，也是我国现代美术运动的最早的倡导者和参加者。1937年，王子云回国担任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不久后便奉命组织西北文物考察团。自1940年，他率团考察西北艺术文物，先后发现、整理了数百处（件）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收集了超过2000件珍贵的艺术文物和不同时代的石刻艺术拓本，绘制了千余件各类艺术文物速写图、写生图及相关地区的艺术文物分布图、艺术文物遗迹实测图，摄制了千余张各类艺术文物题材照片，拓印了上千套（张）各类石刻艺术拓本。

1942年，王子云在国内率先建议教育部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1945年8月，他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获文物2000余件一同并入西北大学，任西北大学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

作为艺术家，王子云所领导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中国艺术家对本民族的美术遗产首次进行的大规模考察，对于中国美术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本人的代表作《中国雕塑艺术史》也是中国第一部雕塑史专著。

王子云等西北联大学人们所取得的这些巨大的学术贡献，是产生于日机的轰炸之下，产生于辗转数千里大迁徙的途中，产生在泥巴茅草屋的教室里，产生在破漏旧祠之中，产生在风餐露宿的大漠驼背之上，产生于那些衣服肘部磨得发亮、袖口、下摆“无边无疆”、过着“盐煮螃蟹”般生活的教授们的近旁，产生于“水煮萝卜”“水煮白菜一口沙”“长袖变短袖、长裤变短裤”“昼夜灯火无眠”的近百名优秀学子之中。这就是我们在所要述说的那个已经伴着大风、伴着大漠，在大西北默默耕耘了80个春夏秋冬的西北联大。

徐诵明在总结此行的要点时，特别说道，“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以后又有“关中为吾国第一古都，南郑又为大汉发祥之地，缅怀先德，兴趣既多，瞻念前途，孟晋益力，誓必尽逐寇孽，光复河山”此次抗战为民族复兴之基，意义重大，亘古无伦。吾侪生此伟大之世，允宜及时精进，努力贡献”的说法，亦即应主动融入地方，成为关中或汉中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

1935年12月，在大学生西迁尚未大规模实施的时候，徐诵明便已经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妥商详细办法，逐步进行”。他还安排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刘运筹到西安考察。由此，邵力子才有了“西北自中央主持开发以来，物质建设成就渐显，唯教育一端依然落后，诚以陕甘宁青新等

省，人口总数在2000万以上，乃竟无一所大学作高深之培养，实不足以应事实上之需要”，免除“全国学区畸形畸重之弊”等重要建议。因此，虽说“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西北联大）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是一个国家战略，但是实施和实现这一战略最核心或最主要的人物是徐诵明。

抗战胜利后，徐诵明带出的北平大学永远留在了西北。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也为西北留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虽复员原址，但也为西北留下完整的工程教育学府。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一路西去，最终止于西北大漠边缘和西南古邛都大凉山（指李石田、魏寿昆、雷祚安、曾炯等将西北联大精神带到西康，创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即今西昌学院），将现代高等教育的制度和理念向西北、西南推进了数千公里，大大加速了西部社会的现代化，成为高等教育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释兴学强国大学精神

从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的成立，到建国前夕各自回迁复校或永留西北办学，这是一个扎根西北、分而有合、子母血脉相连的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其母体与子体在大西北艰苦卓绝的办学过程，形成了一支包括705名教授、副教授和2169名教职员的教师队伍，培养9015名学生。截至2016年6月，从直接相关的10所高校师生中走出202名学部委员、两院院士，在人文与科学领域成就70余项重大发现，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最绚丽夺目的篇章之一。

西北联大及后继院校在培养人方面也取得骄人的成绩。早在1949年以前，学校的毕业生中就走出了中联部副部长、驻古巴、印度大使申健，驻苏大使杨守正，著名作家柳青，全国学联主席郑代汎，开国大典播音员齐越等一批卓越人才。

到1949年，从国立西北大学和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合聘教授和学生中，走出了汉语拼音之父黎锦熙，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人民哲学家的沈志远、大庆油田的发现者田在艺、著名植物学家阎隆飞等10位院士；在科学领域，从当训的西北工学院师生中，走出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师昌绪、冶金物理学的创始人魏寿昆、我国核燃料事业的奠基者张沛霖，首个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等13位院士；国立西北农学院师生则走出了创立土壤热力学的虞宏正、奠定农作物分类学的林察、创立土壤黏性测定法的侯光炯，著名兽医学家盛彤笙等9位院士。在医学方面，毛泽东同志1943年时的保健医生、后来的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晚年保健医生姜泗院长士均为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西北联大医学院毕业生。

除了卓越人才的培养外，西北联大与其血脉关联院校还在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我国最早的高等教育训导制便初创于此。1939年，该制度还在重庆举行的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被向全国推广；在这一年，西北联大还继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洋工学院传统，增设师范研究所和工科研究所（分为采矿、冶金、应用地质3组），招收研究生，这也成为我国最早师范研究生和矿冶研究生教育的开端。

在学科建设方面，1938年5月，西北联大成立考古委员会，主持对张骞墓的发掘维护，这标志着西北联大一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诞生和重要发展，并由此建立了扎根我国西北的首个大学考古学科，培育了西北地区最早的一批科学考古人才；5年后的1943年，教育部批准国立西北大学边政学系正式成立，这使得该校与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全国最早设立边政学系的国立大学，当时的毕业生也成为西北地区最早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边疆干部。

此外，西北联合大学与其血脉关联院校还开展了我国北方最早的电化教育。1945年，西北师范学院袁敦礼在访美期间，特聘回电化教育专家葛泽教授，还购买了电化器材及影片，并在北平师范学院成立电化教育委员会，专设电化教育室，还申请呼号、波长、频率，专门设立了教育广播电台。

值得一提的是，同在1945年，我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与西北联大、西北师范学院体育教育家袁敦礼、董守义两位教授一起，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二届理事会上，提出了“第15届世界运动会（1952年）在我国举行”，这也是我国首次提出申办奥运会的要求。同时，学校还拥有中国近代早期由国家争得荣誉的第一个中、长跑国际冠军的郭毓彬和获得第一个国际篮球冠军的运动员王耀东。

当前，对与西北联大的历史贡献，学界也逐渐形成了共识。正如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清海认为的，如果缺少了西北联大的历史，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就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天津大学原校长李家俊则表示，西北联大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办学联合体，在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艰苦奋斗，弦歌不断，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它的艰难历程充分诠释了兴学强国的大学精神，反映了根源于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诉求，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精神在大学文化中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现代大学捍卫真理、坚守正义的基本理念和扎根中国大地生成起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世界上著名大学都是依靠文化的不断积淀和独特的大学精神逐步赢得世界声誉的。80余年来，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取得的这些重大成就和重大贡献，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要艰苦得多，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甚至要忍饥挨饿或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确不易。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研究其形成的背景、基础、机制，传承这些优秀传统，显然对现在与未来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西北联大联盟秘书长、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教授）